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6.013

严复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之再检讨

杨肇中^{1,2}

(1.福州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116;2.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严复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先驱。他基于对“中体西用”观念的批评,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观点。他对于个体自由与集体利益界限的强调,缘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境况的洞悉与把握。其思想发生了从执著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原旨向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转变。其中不变的是,他对自由主义之于中国现代性价值重建的意义的重视。

关键词:严复;近代中国;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5)06-0083-05

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特定时代,近代中国知识人的思想观念虽然呈现多歧且多变的复杂面相,但是在这一看似纷繁而矛盾的思想潮流中仍然贯穿着一条思想的主脉。这就是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的追寻。舶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份颇值珍视的思想资源。然而,近年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评价似乎并不高。学者多将其定性为“一朵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如果仅限于中国近代史上百余年间的特定时段,此论似无可疑,但置于长时段的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的考察,却颇值商榷。^①在笔者看来,欲深究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衍变之情实,首先对其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检讨是十分必要的。而以往学界基于此的讨论虽不在少数,但仍难于摆脱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维的拘囿,最终对是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谱系的估价落于悲观,抑或嘲讽之地。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严复思想入手,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之曲折与前景略作探讨。

一、严复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接引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近代著名翻译家、思想家。19世

纪末,严复因激于时愤而大量翻译西学著作。其中《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原富》等译作多为是时国人所推崇。梁启超称其为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蔡元培亦认为,“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在他接引自西方的诸多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进化论与自由主义思想。^②也难怪后世学者将之视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③

自由主义流派众多,概念多歧,并无某一确切之定义,诚如同样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之重要代表人物的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所说,孙中山先生曾说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这也像国内外学界对于文化的定义一样。尽管如此,归纳自由主义的核心性价值内涵还是可以做到的。约翰·格雷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正式提出自由主义的四个特征: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平等主义的(Egalitarian);普同主义的(Universalist);淑世主义的(Meliorist)。其中“个体主义”是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以个体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社会政治思想。^④

收稿日期:2015-10-05

作者简介:杨肇中(1977-),男,江西南昌人,福州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自由主义原本是西方近代中产阶级对封建贵族进行挑战与革命的思想武器。在西方社会影响力极大。1877年,严复曾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到英国学习海军。其间,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社会哲学理论,如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进化论以及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在1879年毕业回国之后的那几年,他并没有从事上述社会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念在当时还是颇具效用的。但是,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之后,知识界顿然掀起巨大波澜。有识之士纷纷反思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及其背后的“中体西用”观念的历史合理性。人们认为,哲学中的体用是一贯、互为契合、不可分割的。所以“以中学为其体,以西学为其用”的说法无疑是荒谬的,并且实践证明企图以此构建中国现代性价值以富强国家的行动失败了。针对这一点,严复曾比喻说:“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4]

严复基于对“中体西用”观念的批评,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命题。在19世纪末,这一在西方已见诸成功实践的观念对近代中国知识人来说无异于石破天惊。严复相继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章引来是时热心国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纷纷侧目。严复认为:“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技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行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4](P2)}由此可见,严复批评以往“中体西用”论中对待西学之明显功利的心态,认为西用必有其独特之西体作为支撑,而这一体之精妙之处则在于“自由”。他接着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

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4](P2-3)}严复“人生而自由”的观念无疑来自西方,其认为政治制度的改革成功必基于人的自由。只有保障个体的自由才能将每个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最终有益于国家的富强。正如他说:“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4](P14)}

自此而后,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进化论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风所趋,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社会主义运动等改造近代中国社会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思想源动力。

二、严复是否歪曲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

对于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译介到中国来的学术贡献,恐怕没有人质疑。但是,国内外学界对于严复是否歪曲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原旨问题有着诸多不同的讨论。这一问题意识的产生可能基于某种后设解释的需要: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自由主义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缘何在现代性社会重建中屡次被边缘化,一再不敌于激进主义甚或文化保守主义?是否从一开始接引过来的自由主义思想本身就是被误读抑或歪曲的呢?随着人们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深入了解,这种思想分判似乎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因此,在国内学界进行重新启蒙,再造中国的反思起点不仅是“救亡压倒启蒙”的近代社会现实,而且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误入歧途有关。然而对此责任的追究自然不得不落在严复身上。

最能明显体现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特质的是其翻译的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该书集中论述自由主义见解的文献较少,仅留下如《群己权界论》自序与译凡例等短篇小文。严复在该书译凡例中明确指出:“斯宾塞《伦理学说公》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由者,盖不自由则善恶功罪,皆非己出,而仅有幸不幸可言,民德亦无由演进。故惟与以自由,而天择为用,斯致治有必成之一日。”^{[4](P133)}严复认为,在进化

律则通行的生物界、人类界，民族国家强大的关键在于自由倡导。针对上述问题，美国思想史家本杰明·史华慈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严复译介《群己权界论》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带有工具理性的考量，但大体没有歪曲穆勒之原意，而是把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思想加以融通而已。他说：“既然严复的自由观中包含了个人作为道德选择的本源概念，那么，他的自由观与穆勒的自由观就不是毫不相干的了。因此，穆勒关于自由的内容就立即被严复以斯宾塞—达尔文主义的语言塞进那些含有适者生存意思的领域，即把自由作为提高社会功效的工具，并因此作为获得富强的最终手段。……自由所以有价值，又一次是因为它对先前所解释过的著名人的德、智、体三结合所作的贡献。”^{[5](P91)}换言之，穆勒与严复在阐述自由时的分野在于：“假如说穆勒常以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5](P96)}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认为这种对“自由”的提倡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引介过来后造成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异动。所以，他试图纠正此一思想之弊。他说：“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由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以二者之皆讥，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颜曰《群己权界论》，畀手民印板以行于世。”^{[4](P131-132)}从严复这段心迹的表白可以发现，他关于个体自由与集体(公)利益的界限的强调，缘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境况的把握与洞悉。他没有因拘囿于工具理性，强调社会权力，反对个体自由而歪曲西方自由主义之本源意涵。严复更多的是关注个体在群体中，必须定位其自由的边界而已，诚如他所说，“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4](P132)}有此边界，个体自由才有保障，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严复对于自由主义的核心性特质的把握不仅非常准确，而且十分理性、到位。因此，把严复之后的近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过于重视集体权力，漠视个人自由的社会运动与现象的缘由归咎于严复是不公平的。

此外，按照现代社会理论突出主体性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管是诠释者还是翻译者必

定带着自己的主观兴趣去处理作品。然而，上述“严复标准”的出现，在美国学者路易斯·哈茨看来，决不是对自由主义的歪曲。他说：“我们不要以为这种说法本身是一种歪曲，当一种思想体系的潜在内容被揭示出来时，表面上总要引起一些骚动或一些重新组合。要是严复没有以这种方式把我们搞糊涂，那么，他对于我们也就没有独到的意义了。”^{[5](P2)}哈茨认为，严复的译著倒是激发了西方自由主义本有的潜在思想，给西方学者以启示。这也就是说，严复是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大熔炉里挑选适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学术资源，这种各取所需的学术行为怎么就歪曲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呢？然而，为什么会造成上述歪曲的假象呢？哈茨给出了一个颇为中肯的答案：“严复提出的西方精神与思想的表现问题，是我们曾经提出过而在当前已不再提的问题。这不是因为问题已有答案，而是因为使这些问题鲜明生动地反映出来的中世纪参照物已退居遥远的背景了。”^{[5](P3)}他肯定了严复对自由主义观念阐发的合理性。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原本流派纷呈，内蕴丰富。严复之所强调社会权力的必要与个体自由的限度，并不是否认后者的重要性，而是突出在近代中国特定条件下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适应性维度。因为一个处于危亡在即的民族过多谈论个体自由犹如水中月镜中花般的虚幻。因此，与其说严复有所偏重，不如说两者存在先后之必要。“己轻群重”实际上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误读。

三、严复之思想昭示中国自由主义之应然路径与前景

以往大陆学界惯于贴标签的手法，用“进步抑或落后”等颇为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对人物进行评判。有学者将这种原因归之于学界自身认识的不自觉的误区，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点：“一、以近代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为标准，判定认同西方文化就是先进，恪守中国文化就是落后；二、在社会变革发展的形式问题上，以为越激进越正确，温和就是保守甚至倒退；三、在分析历史人物自身思想的演进过程时，往往简单地要求其所谓时代步伐同步，一旦革命思潮出现，那么一切与之不相一致的社会理想、文化诉求、道德指向统统失去积极的、建设性的思想史意义。主张此类社会理想、文化诉求、道德伦理的历史人物，统统成为批判的对象。”^[6]此论颇为切中肯綮。在近代思想史上最初的几十年中，许多

伟大学者的思想观念大多经历了剧烈的变化,甚至呈现出看似相互矛盾的变动。但他们这些观念转换的合理性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后人的“同情之理解”,而是被传统与现代、革命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思维所撕裂。严复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锋人物,将西方近代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自由主义思想接引来中国。他所提出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观念,迅速蔚成风靡一时的思潮。不过,辛亥革命之后,严复向后来遭遇举世讨伐的袁大总统靠拢,成为筹安会主要成员。严复此举使得他自己的崇高声望急剧下降。因此,“思想倒退”似乎成为时人甚至是今人对严复的盖棺定论。细细想来,原因皆在于近代以降中国激进主义思维的泛滥,以至于人们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理性。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在近代中国,因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思想的激进化也停不下来。思想与现实完全分了家,便只有在激进的轨道上向前飞驰。”^[7]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饱受激进主义情绪熏染的学界来说,要静下心来分析与反省严复思想的内在学术理路便成为一种奢望。由此而观,严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正确的评价也是时势使然。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人们基于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在东方的传统中逐渐找到契合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从而破解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思想迷雾。另外,中国大陆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这股西风所浸染,以现代化叙述荡涤革命叙事。因此,革命话语中的进步与落后的评判模式也逐渐失去了所谓的昔日辉煌。时至今日,虽然现代化理论已经得到修正,但在学界仍然具有较大的探讨空间。而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即是现代性。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本质性的规定。它可不是一种静态的显而易见的东西,而是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中不断摇曳着朦胧身姿的魅物。正是这一特性导致人们对它的认知呈现多歧且多变。其实,严复思想中在进化论思维支撑下强调个体自由的重要性的思想旨趣并未改变。只是随着历史时空的变迁,发生了从执著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原旨向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转变,不变的是他自始至终重视自由主义思想之于中国现代性重建的意义。

继严复之后,接过自由主义旗帜且影响较大的当属胡适。不过,严复传承的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

而胡适则是秉承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功利自由主义。“功利自由主义是跟其民主政治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它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应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发挥,竭力提倡个人对公众事务与社会福利的关心与参与。”^[2]胡适除了短暂地出任驻美大使一职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界倡导自由、民主精神。但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也仅仅停留在理念之上,得不到真正实践的社会土壤。1949年之后,胡适带着他的自由主义理念穿梭于美国与台湾之间。最后,坚守思想、言论自由精神的他抱着一丝遗憾终老于台湾。不过,胡适留下的自由主义火种在台湾已成燎原之势,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台湾现在的民主政治。

纵观中国近代思想史,自由主义思潮来势猛烈,影响极广,但却运命多舛,成为了“一朵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湖北大学何晓明教授曾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遭际有一段较为精辟的言说:“在西方是社会运动孕育思想,思想反哺社会;而在近代中国则是社会运动寻找思想,思想干预社会。孕育,则生命机理自然流畅;寻找,则带有强烈的功用方面的考虑,无暇也无须顾及理论的圆熟与平允。”^[8]自由主义理论的圆熟与平允问题在“社会运动寻找思想,思想干预社会”的近代中国遭遇了一种难于逃遁的困厄,这确乎是不争的事实。它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维度中也不免无果之花的遗憾与讥评。但这朵极具人文主义气息与普世品格的精神之花,在日益远离近代激进主义喧嚣的中国现代性构建的途中,其贡献与前途或许仍是未可限量之事。

注 释:

- ① 自由主义思想的缺位对迄今仍处于探索何为现代性价值过程之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思想史的视野而言,自由主义在中国现代性重建的视域中,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这朵精神之花的结果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
- ② 也就是因为人们对于作为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家的严复的印象异常深刻,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学界对他的研究与评价时常发生一定程度的偏差甚或误解。

参考文献:

- [1] 胡伟希.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3.
- [2] 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88.

- [3] 严复.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8-559. [J].湖北大学学报,2006,(1):7-13.
- [4] 严复.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4.20.
- [5] [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8] 何晓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朵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N].光明日报,2008-01-13.
- [6] 何晓明.破解历史的怪圈——康有为、严复、辜鸿铭合论

(责任编辑:许桃芳)

A New Comment on Yan Fu and Liberalism of Modern China

YANG Zhao-zhong^{1,2}

(1.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6, China; 2. Center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Modernization Researc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Yan Fu was the pioneer of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movement.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 Zhong Ti Xi Yong" concept, put forward the viewpoint of "For the body of reedom ,For the use of democracy " . His emphasis on about the boundarie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collective interests, because of the insight and grasp well the social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thought has occurred from the original western liberalism to b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mong the same of them, attach importance to significance of liberalism for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stic value.

Key words: Yan Fu; modern China; liberalism